

東方 專制主義論

——亞細亞
生產模式研究

魯凡之 著



東方專制主義論

作者 / 魯凡之
發行人 / 王麗芬
出版者 / 南方叢書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景美區興隆路二段196號8F之1
電話 / (02)9343174 · 9343732 · 9312662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95號
劃撥 / 1159975-7
美術設計 / 林翠華
印製 / 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261巷12弄45號
總經銷 /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 / (02)3946693
初版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再版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定價 / 180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東方專制主義論
——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

目 錄

- 序 魯凡之 3
- 代序 掃除列寧——亞夫林主義的幽靈 南方朔 7
- 上篇：「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在西方所引起的爭論 19
- 中篇：「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在中國所引起的爭論 69
- 下篇：中國發展形態論 151
- 附錄一：關於中國文化結構研究的討論 193
- 附錄二：當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與發展方向 215

序

魯凡之

我之所以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問題，主要是爲了研究中國文化結構的特殊發展形態（包括當代的、中古的、古代的）；當代國情的波譎雲變，錯綜複雜，促使每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的中國人，都猛力地要求自己從血淚斑斑的國情覆轍裏，提出理性的反省，以及作出實事求是的辯證檢視；正是民族的慘痛生活現實告訴我們，若要抽絲剝繭地探索中國問題的根本，便必須從政治、社會、經濟背後去看整體的文化結構，從一般的所謂民族性背後去看經濟基礎的生產方式，從當代多層次的國情現實背後去看變動甚少的文化原型。我們要以遙望未來的眼光回溯過去，以當前實踐的要求來探索歷史。在中國，「過去」的細胞並未完全變成過去，「歷史」的組合也並未完全成爲歷史；傳統中國仍然在當代中國的深層裏活著、「死去」的中國仍然拖著「活著」的中國。在中國，所謂「活著」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名符其實的掙扎奮鬥的「活著」，另一種則是「死拖著」的「活著」——「半死不活」。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一個產生於西方文化的理論範疇，是馬克思在研究以前的西歐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等領域的相關範疇所提出的概念；在馬克思的原著裏，「亞洲亞生產方式」並未確切的介定，它時而被理解爲當時被英國佔領的印度、時而被理解爲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世界（或當時歐洲人所稱的亞洲）、時而理解爲歐洲以外的所有「非西方」世界。作爲一種理論性的分析架構，「亞細亞生產方式」對探討中國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裏的傳統結構問題，是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的；但與此同時，「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亦有其局限性——

第一、馬克思本人並未將這個理論充份地條理化、系統化，即根本就是一種未成熟的理論；

第二、這個理論無可避免地多少帶有西方文化的偏見或是建基於對東方文化及歷史的片面認識；

第三、馬克思這個未成熟的理論，落到變種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手上，被扭曲附會為所謂「東方奴隸制」或「東方封建制」，被當成為所謂世界「共同發展規律」（單線論）裏的一環，而闕割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說法本身所包含的世界發展「多線論」傾向。

因此，現在要做的理論研究是：首先將「亞細亞生產方式」從斯大林主義「單線論」裏解放出來，恢復其在馬克思本來那種「多線論」的傾向；其次是將東方各種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從籠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範疇裏解放出來，而提出具體的「中國生產方式」或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生產方式及發展形態；再次是從綜合中國範疇內各民族、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包括歷史與現狀）出發，概括出真正屬於「中國生產方式」及「中國發展形態」的特殊發展規律（世界發展「多線論」裏的一「線」），而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只不過在方法論上提供參考性的分析架構而已。

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是介紹西方及傳來中國後的理論爭論，包括方法論借用、與國情實況結合和辯證揚棄的過程。因此，在這本書裏（部份原稿完成於一九八〇年十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之間，當時曾發表於一群朋友自己合作主辦的（新社會）季刊），我區分為上、中、下三篇：

上篇介紹西方「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探討和爭論；

中篇述說「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傳來中國後所引起的

爭論；

下篇則結合「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部份，提出關於「中國生產方式」及「中國發展形態」的基本分析架構。

可以說，我研究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是爲了研究「中國發展形態」及其特殊發展規律；而研究「中國發展形態」，則一方面既爲了探索當代錯綜複雜的「中國往何處去」的根本問題，另一方面則亦爲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探索，作出一些初步的嚐試。

魯凡之序於香港

一九八三年九月

掃除列寧—— 史大林主義的 幽靈

——代序「東方專制
主義論」

南方朔

「革命首先發生在蘇俄與中國，但它並非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無產階級革命——產生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相反的卻是國家資本主義革命，它客觀的說，絕對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用來作為這種變態資本主義體系的口實而已：它不再是受市場競爭所決定，而是由威權主義國家所控制。它以農民為基礎，加速工業化以創造工業無產階級。它已放棄了傳統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但並未放棄資本的社會關係。這種資本主義未曾被馬克思及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預見。……現在，社會主義已和國家資本主義間劃上等號關係，……革命變成了反革命。爲了結束資本主義，已需要一種結束蘇俄布爾雪維克意識型態以及反布爾雪維克革命運動的興起。」

——馬提克（Paul Mattick）

已故的法國思想家富柯（Michel Foucault）曾經感慨的說過，自從一八四八年大革命時代以來，人類的歷史就走錯了。到了現在，所有曾經閃爍過的希望光芒都已不再光亮，人們再也找不到新的定位，因此，他認為：「我們必須退回一八三〇年，我們必須重新來過。」

富柯的感慨其實是很可以用來觀照那些曾經打動過人心，號召過千萬仁人志士的古典自由主義及古典社會主義思想。因為，古典自由主義的元老們如盧梭、洛克、亞當斯密等，他們絕未預測到賡續於古典自由主義之後，它接著的發展竟然是帝國主義！而古典社會主義的先驅們包括馬克思在內，亦從未預見到以人道公義為本的社會主義，它在蘇俄及中國等地的實踐竟然是古代專制暴君的再現！

因此，廿世紀的七〇以迄八〇年代乃是知識份子重新反省的歲月。所有的「神話」都在崩解，所有的人民都開始抗爭。在東歐，繼「匈牙利革命」、「捷克入侵事件」之後，幾乎全國人民都動員的「波蘭團結工聯運動」發生了，在捷克、東德、南斯拉夫，甚至蘇俄本土，反抗運動接連發生並普遍要求人民有組黨的自由。列寧—史大林主義的欺妄性已被活生生的人民歷史所粉碎。如果我們有興趣翻查列寧在革命前後的著作與言論，便可發現他在革命前所抨擊的正是革命後的自己！如果再核查史達林的著作與言論，它所呈現的乃是最大膽的詭辯與語言暴力。蘇俄與東歐的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將使馬克思也將為之悲憤的事實。

蘇俄及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成果，對近代馬克思主義者而言乃是一種「苦果」。捷克及南斯拉夫、波蘭等國的知識

份子創發了以人道爲本，以「民間社會」爲綱的「實踐學派」，要求那個曾被列寧—史大林主義者認爲是「資產階級民主」及「內戰的新戰爭販子」的「民主」！至於西歐，我們則看到了在「民主」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與德國盧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一致，均反對列寧主義的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先驅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的家鄉開始首揭「歐共主義」的大旗，其他國家的共黨也相互協力呼應。它們普遍的作出「歷史性的決裂」—向列寧—史達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被放棄了。這不僅是「戰略」的改變，而是整個知識理論的脫胎換骨。由近代社會主義發展史及理論的演變，這個過程可以作這樣的解釋：社會主義運動在「第二國際」那個時代，由於它未曾在任一國家獲得成功，因而理論及運動百花齊放，然而不幸的是，它在俄國成功了。俄國的列寧—史大林主義挾著「勝利者」的支配性地位而獲得霸權，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傳統被併吞、消彌。這是「詮釋方式」（Mode of Discourse）的被列寧—史大林主義所佔領。其他社會主義傳統，甚至包括馬克思本人的都被切斷。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或者基於「大西瓜主義」—俗諺的「西瓜靠大邊」，或者基於現實利益的需要，都成了蘇俄這個「一國社會主義」的庸屬。這是一種「依賴」，只有等蘇俄列寧—史大林主義的霸權呈現危機，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才能找到反省的機會。近代由於東西方社會均出現危機，左右翼均開始重作歷史性的反省。在古典自由主義這方面（現在已稱爲保守派），已開始重建個人主義理論及新的國家理論；在西方改良主義方面（現通稱自由派，社會民主派或福利國家派）也開始從倫理學的「正義理論」開始重

新出發，為「多元重疊的民主」找尋新的基礎；至於左翼，則為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找尋立腳點，而其根本，則是全部向列寧—史達林主義說再見。領導波蘭知識份子反抗，為「團結工聯」先驅的柯拉可斯基（L. Kolakowski）在一九六九年時有過這樣的預言：

「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乃是思想的一個個別學派，它將逐漸漫漶，最後消失。正如同在物理學上，沒有人永遠崇拜牛頓主義。植物學界沒有人永遠崇拜植物分類學創始人的林那主義；生理學界沒有人永遠跟隨解剖學先驅的哈維主義；數學家也不會永遠釘住高斯主義！因此，馬克思的著作在科學發展的自然過程中有甚麼是永恆不變的？」

近年來，由於東西方國家的共同反省，無論知識份子或共黨國家的官方均有了巨大的改變。蘇俄的領導人哥巴契夫推展「開放政策」（Glasnost），南斯拉夫自「狄托神話」破滅後，連帶的也揭發了以往曾使許多人眩惑的「南斯拉夫工人管理」乃屬騙局，南共可能改走政黨政治路線；當然更不必說中國大陸及越南了。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在走過列寧—史大林主義，以及它的各國樣板（如毛澤東主義及狄托主義等）之後，各國共黨領導人也都向列寧—史達林主義再見。而在知識份子的理論實踐上，近代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基線乃是向代表「官府派」的列寧—史大林主義決裂，重新界定「國家—人民」、「社會主義—民主」等發展辯證的關係。馬克思已消失的作品被重新找了出來，已被打成反革命思想的「第二國際」時代的理論家被重新肯定。馬克思主義開始多元化，然而儘管它外表型態不一，基調上亦均類似，那就是為「國家—民間社會—階級」尋求新的辯證統一關係。馬克思主義及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價值—「真實的個

人」有了新的對話關係。

有關馬克思學說中核心部份的「生產方式論」(Theory of Modes of Production)，尤其是與開發中國家有關的「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以及與其有關的「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等古典問題也就在這種「大反省」的時代需要下再度復活。如果我們能回顧一下這些理論的變化，以及「理論再生產過程」中被列寧—史達林主義所作的扭曲，它的真切意義就很清楚的浮現了出來。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吳大琨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及「東方專制主義論」復活，於此同時，我們又看到金觀濤及劉青峯等人的論中國古代官僚主義的傳統及「超穩定社會結構」，北大及清華等校教授包括李澤厚，費孝通等也都汲汲於揭棄列寧—史大林主義，李澤厚與西方新馬克思主義中的「康德學派」相同，向康德哲學處尋找「真實的個人」的立腳點。本人曾與數位大陸學者有過交談，他們均表示，現在大陸的思想重點是消除「俄化」殘餘，這種思潮的變化，事實上正是推動中國現階段再啓蒙以及政經改革的知識動力之一，也是大陸知識份子運動的淵藪。「亞細亞生產方式論」與「東方專制論」的重新被提到時代論壇之上，它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爭論，從來就是和「東方專制主義」結合在一起。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這種理論的配對有過許多複雜的轉折，我們可以作如下簡單而扼要的敘述。

早在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就對古老的東方有著一種印象與直觀的見解。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裡有關政體的分類

敘述中即說過：

「另一種君王制乃見於若干不文明的，即非希臘的民族中，這種君王具有類似專制政體的權力，……而且是以父子相傳的，原因則在於這些不文明的民族較希臘人更具奴性，例如亞洲的民族較歐洲的民族具奴性，而因此他們更容忍專橫的統治而無任何怨言。」

亞里斯多德的此種東方見解，學術思想史上，我們稱之為「東方主義的原型」(Archetype of orientalism)。及至啓蒙時代，在盧梭、洛克、霍布士、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邊沁、約翰彌爾等著作中也都可以清楚找到此種是有「歐洲中心主義」觀點的片段。此種「東方主義」在韋伯社會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有了集大成的體系化闡釋。由於「東方主義」有著這樣的傳統，往後的開發中國家之民族主義份子均含糊籠統的將其打為「帝國主義」，而忽略了西方自亞里斯多德以降的那個政治大傳統中有關人權尊重，民主法治的普遍元素。

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便是在這樣的條件中呈現了出來。我們大體上可以這樣認為，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乃是古典時代諸思想教父及黑格爾主義的延長，認為東方乃是一個落後、停滯、專制的社會。全部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在往後有了繼續而深入的發展，所謂的「現代化論」即其中最庸俗的形式。

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乃是一個只有扼要敘述，但卻未充份建構的觀點。它延續了西方古典政治社會學有關「國家（或政體）－民間社會」配對的二元體系，認為東方社會乃是一個土地由國家所有，藉「地租－稅收並行制」(Rent / Tax Couple)而形成的生產方式，它和歐洲不同

，不能發展出脫離國家宰制的都市及民間社會，代表國家的君主藉著官僚體系及重大公共工程（如治水，建造文獻式的公共建築物）而集中權力。這樣的體系只有政權的遞嬗，而不可能產生自我解放的動力，因此它是靜態的，歷史循環的。馬克思的論點和韋伯社會學異曲同工。這種「東方主義」的基調，在往後的發展中被許多西方及東方學者充實和變型。有人從社會結構出發，認為東方社會乃是一種「鑲嵌式的構造」（Mosaic structure），各獨立或敵對的社群不能整合為改變歷史的動力，而只能成王朝統治者的宰制對象；有人則從歷史轉換的觀點出發，而提出「非革命論」（No Revolutions Theme），認為東方社會不可能出現社會結構改變的革命，它的革命縱使在現代也只是政變或篡位等。

馬克思本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有兩重意義；(一)它是所謂的「內因論」（Internalism），認為東方社會並無自我解放的結構性原因。(二)它是「單線論」（Unilinearism），認為不同的生產方式乃單線的演化過程，這乃是一種「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雖然馬克思本人一度曾對這樣的立場自我批判，認為不同國家可以有獨特走向資本主義的路徑，但他的這種見解並未繼續發揚。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對俄國的觀點。在一八五六以迄五七年間，他於「十八世紀外交史的演變」等一系列的專文中及以後的許多著作中的認為沙皇政權乃「半亞細亞式的」，亦即沙俄在後蒙古族佔領後已成為一個東方專制體系。

列寧在早期也踵繼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點。一九

○六年在和孟雪維克領導人普列罕諾夫討論「土地國有」問題時，他也耽心過布爾雪維克將因土地國有而墮落成老沙皇政權的可能，這乃是列寧一度的「亞細亞復辟」(Asiatic Restoration)，然而稍後由於俄國的東方政策之需要，列寧遂在現實政治的目標扭曲下任令「亞細亞復辟」發生而不置評。到了史大林時代，由於它的本質已成了「亞細亞復辟」，他自然禁止此論再現；史大林爲了在後進國家中居於領導地位，遂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奴隸制附會。

由「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東方專制主義」的此種演變，可以看出列寧—史大林主義由於本身乃係「亞細亞復辟」，遂禁止「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東方專制主義」的討論，並逕以政治迫害手段將此論視爲「托派」而打擊。

由此，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及「東方專制主義論」這組相互配對的理論。從一九三六年斯德哥爾摩會議之後即不斷受打擊的原因也就不問可知了。以這個理論來詮釋中國歷史發展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維特佛格(Karl A. Wittfogel)也倍受打擊，其道理自然不言可喻。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由於受到帝國主義的刺激，相當多人對於以「東方主義」觀點詮釋中國歷史者均認爲是「帝國主義」，是「反革」。不過，這種民族法西斯主義用到維特佛格身上卻完全搞錯了對象，其狀況一如史大林主義者也以民族主義掩護他的暴行，將「東方專制主義」者以覺的決議制定爲「托派」。

維特佛格事實上乃是一個「愛華」但反「東方專制主義」的德國漢學家。他經由對俄共與中共之觀察，而延續了馬克思的「水利」觀點，來爲中國自古以來的官僚主義(包括

共產官僚)作診斷。他陸續有過多本有關「東方專制主義」的著作。維特佛格的論旨事實上可以分為兩個部份：一部份是「水利國家」(Hydraulic State)的理論。另一部份則是「東方專制主義」。這兩部份可以有因果難係，但後一部份也可單獨存在。有關「水利社會」這一部份，他的論證乃延續了亞當斯密，約翰彌爾、馬克思三人而來，認為中國古代由於治水，而逐漸發展為君王帝國民及官僚主義，從而成為「完全權力」的宰制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下，人民完全被宰制，只有與政治不相干的自由，只有乞丐式的民主。維特佛格以人的自由為主體的「大歷史觀」清整的浮現出真正人道主義歷史學家的關懷。因之，俄共與中共均對他不斷抨擊。並蓄意將他的史觀詬讐為「技術決定論」，稱他是「水利史家」，而將他學說中有關「東方專制主義」可以獨存的部份故意貶抑。有關維特佛格的「水利社會」這一部份，儘管有波南依(K. Polanyi)等人不同意，然而中國古史學家黃仁宇，中國古代經濟史學唐宗明，匈牙利漢學家巴拉茲(Elienne Balazs)，……等均贊同。哥倫比亞大學考古系教授馬文哈端斯(Malvin Harris)等亦認為新的考古學證據可以支持維特佛格的見解。稍後，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梅樂蒂(Umberto Melotti)，著名的比利時托洛斯基主義理論家孟岱爾(Ernest Mandel)等對維特佛格之理論也局部同意。

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及「東方專制主義論」這一組配對之理論，如果我們能注意它的內容及變化，或許會發現它事實上是三個層次的：

(一)在「生產方式」的轉化方面，它涉及經濟史觀中有關模型